



抗戰時期母校規模真實呈現

從 1939 年中華中學畢業頒獎禮新聞報導說起

黃潔玲

這篇刊載於 1939 年 7 月 24 日《華僑日報》第 2 張第 2 頁「本港新聞」版的中華中學畢業典禮報道，塵封了近 80 年後終重見天日，它清晰地闡明中華中學作為在香港創辦了 13 年的私立中文學校的真實狀況，包括教師人數、班級及學生人數、收生狀況、擴校計劃等等，顯示母校已成為一所初具規模且極具發展潛質的學校。有鑑於創校校長黃冷觀在內地與本港社會的影響力，母校續得到國民政府內要員的支持。當時母校正處於祖芬校長繼承乃父興學遺願的接棒時期，他洞悉時局脈搏銳意擴校擴班增收學生，且取得了實質的效果。面對國難當前，母校由上而下注重愛國情操的教育與抗戰觀念的培養，並積極投入支援抗戰的宣傳、募捐與慰問南下避難同胞的實際工作。以上種種，填補了校史中在 1939 年前後這個重要發展時期曾經推行的措施，實為今後進行校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香港頓成教育中心

「去年七月廿四日，敝校假座娛樂戲院舉行畢業頒獎禮，當時時局已極緊張，港中華僑教育界感覺其自身責任之重大，亟謀教育發展，使從淪陷區來港之青年，得繼續其學業，並為國家培養人才，以供此非常時期之用。敝校於舉行畢業禮時，亦告誡畢業同學如何負起此非常責任。不想三月後，廣州漢口相繼失陷，廣州學校遷港者百十，各地逃難來港之學生數十萬人，使文化落後之香港，一變而成為南中教育之中心。（摘自黃祖芬校長歡迎主禮人蒞校參觀的《歡迎詞》）」



▲ 1938年10月，日軍攻入廣州，珠江大橋兩岸濃煙滾滾。



▲ 1937年日軍侵華，大量難民由內地湧來香港。在有蓋道上棲息，兩旁更是徬徨。

1937年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越年廣州淪陷，為逃戰火續辦教育，眾多粵校南遷香港，遂使香港學生因而驟增數十萬人。黃祖芬校長交代了這個嚴峻的時局，亦一針見血地道出了辦教育以培養國家人才此非常責任。正因為這樣而造就了母校發展的契機。縱然鴉片戰爭後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鼓吹私人辦學及興辦英文中學。當時英中多是由教會興辦，而中文中學則多屬私立學校。唯當時的英中並非受到家長一面倒的傾慕，為數不少有學養的家庭、尤其中產或以上的傳統家族，均認為學好本國語言文化最重要，故頗為願意把子女送進有名望的中文中學讀書。



▲ 1939年一位女學生在中環賣花籌款，賑濟因戰爭流離失所的內地難民。

就目前所能掌握極為有限的資料中仍可得悉，香港望族之一、銀行家族之首李佩材家族的第三代成員李福善（前高等法院上訴庭副庭長、香港法律元老）、李福述（香港前民政司）均是1941年前的校友；本港著名航運企業家董浩雲（香港船王）家族成員董建華（香港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亦是50年代的校友。母校當時取錄了不少具有類似背景的學生，加上大批南來學生繼續學業的需要，因而擴校發展的空間明顯存在。而接任校長一職不久的祖芬校長，抓住這個時局的變化，本著作為



▲ 1939年演員吳楚帆與梁上燕於一場球賽舉行期間義賣，為抗日活動籌款。



▶ 日軍侵華期間一群逃難中的婦孺。



教育事業繼承者的熱誠及敏銳眼光，及時擴充校舍及添置設備，開辦高中課程等，容納更多青少年入學。

略窺學校畢業禮雛形

從這份新聞報道中得悉，母校在畢業典禮當天的上午 8 時，先邀請主禮嘉賓、董事長吳鐵城參觀位於堅道的校舍及向學生訓話，全校學生齊集操場歡迎。吳氏隨後聆聽了校務工作概況，臨別時更與小學生進行交談。上午 11 時移師到中環的娛樂戲院舉行畢業禮儀式，有孫仲瑛、高廷梓等千餘嘉賓到場。程序有黃校長發表校務報告；孫仲瑛致訓詞及頒發獎品、證書；友好學校、校友會主席致祝詞等。儀式後，由香港中華合唱團演出助慶。



▲當年國民政府要員吳鐵城，出任畢業頒獎典禮主禮嘉賓。

這是在母校創校校長黃冷觀於 1938 年逝世後、由他的大兒子黃祖芬接任校長一年後的畢業禮，從其邀請的嘉賓、致詞的內容、安排的程序，正好向社會全面展示作為繼任校長對辦校宗旨的繼承與發揚；與此同時，亦可窺見上世紀 30-40 年代，作為香港乃至內地中學畢業禮的基本程序與形式，大致分成典禮及演藝表演兩個環節，至於頒獎的名目亦基本是學業成績與表彰服務精神兩大類型，除了參觀校舍環節之外，其他形式可以說是一直大同小異地延續至今幾乎 80 年，教育事業繼往開來的傳統，由此可見一斑。

母校發展初具規模

母校創立及成長於國家戰亂時期，校舍多次搬遷，資料嚴重失散。而隨著學校在 1980 年停辦，時光荏苒，老一輩師長相繼過世，對母校在上世紀 50 年代之前的發展歷程一直是難以稽考，有些地方甚至是一片空白。然而，憑藉這段報道，可以嘗試解開母校在上世紀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初學校規模之迷。

「本校廿七年（編者註：指民國廿七年，即 1938 年）度下學期，共有教職員 27 人。」「至於學生人數上學期為 438 人，下學期為 442 人，中學部 120 人，小學部 322 人。兩學期比較，只增加數人，其原因係因校舍不敷，各班額位已滿，無法收容。查上學期投考學生 200 餘人中取錄 90 餘人，下學期投考者 100 餘人只取 30 餘人而已。」「最近擴充右鄰堅道 20 號洋房一座，故下學期入學之新生，當可量其程度收容矣。現校舍兩座課室 18 間，可容 700 餘人，校舍操場可供學生課餘運動及遊戲。」（摘自畢業禮黃祖芬校長《校務報告》）

黃祖芬校長在人們眼前展現出母校擴展可見藍圖。據載，母校於1933年後，曾先後遷入堅道85號、91號及22號作為校址，上述正好記述1939年位於堅道22號的校舍向毗鄰擴充，學生將以倍增加，誠是母校再求發展的另一階段。

至於當時所開設的班級，據頒獎禮上所開列的各級得獎學生名單中，清晰可見當時開辦的班級由附小一至高中一，全校共10個級，除附小五及附小六開設了甲、乙兩班外，其餘一律是一級一班，即共12班。又由於當年的畢業生是初中及小學的兩批學生，故此高中一年級很有可能是在1938年初開設的，由此推斷，即使在正常的狀況下，最快要到1941年才誕生第一屆中學（高中三）畢業生。

由此可見，當時香港奉行的是小學六年（初小3年、高小3年）及中學六年（初中3年、高中3年）的學制。在後來的數十年儘管學制有所變更，特別在中學方面的變動較大，唯是到了現在仍是隨全國與世界的大流，恢復中小學的六三三學制。

透露黃祖雄北上行蹤

「去年10月，黃教務長祖雄，以第二期抗戰開始，為考察國內戰時教育起見，乃請假回國，期以一年，如交通無阻，下年度開學時，黃主任當可返校。」（出處同上）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1945年在香港邊界附近行軍情況。



《校務報告》在提及新學期教師的去留狀況時，提到了教務主任黃祖雄的動向，這亦是目前唯一掌握到由黃校長親口透露黃祖雄校友（黃校長四弟）訊息的記錄，印證了梁狄剛校友（黃校長外甥）較早前在本會會刊《國光》發表有關事跡的記述。黃祖雄校友是戰前校友及老師，幼時曾隨著名書法家鄧爾雅學習，寫得一手上佳的篆書，亦修煉了扎實的文學根基。1938年10月告別了母校及家人，北上抗日，隨後加入了八路軍，在軍中不避艱苦的軍旅生涯，不但作戰英勇，還享有「軍中好秀才」的美譽。1942年2月在一次八路軍反「掃蕩」戰鬥中，不幸犧牲在太行山南麓，時年30，為挽救民族危亡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成為了抗日烈士。縱然烈士返校無期，卻成為大家最尊敬與推崇的傑出校友之一。（黃祖雄校友的抗日事跡詳見《俊傑篇》，第176-182頁）

發展體育 重視身心健康

「體育方面，除球類運動外，中學注重器械操，小學注重柔軟操。本校之器械操器具大致齊備，中學各級學生對此甚感興趣。小學生之柔軟操，以發展其身心之健康為目的。去年12月，本校小學四年級學生參加本港教育局舉辦之全港小學生柔軟操比賽再獲亞軍。」（出處同上）

校務報告內容當然缺不了談及五育的推行，母校在保證恆常的課程學習之質素外，對體育項目的推動亦顯得不遺餘力，且從小做起，引導學生注意鍛鍊，培養健康的體魄，令學生一生受益，而獲獎僅是其副產品而已。重視體育是一項很明顯的辦學宗旨，亦成為母校優良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及至戰後1946年，母校在羅便臣道123號復校，在環境相對較為穩定的狀態下，體育運動更發展至一個登峰造極的時期，一所私立學校同時擁有一個田徑場、大小兩個籃球場；每班有球隊，全校有校隊；更有年度性的爬山比賽；但凡節日聯歡會上，人人皆可大跳集體舞，體育、舞蹈練習變成了經常進行的遊戲。所有這些，都是對優良傳統的一種繼承與發揚。

展開抗戰教育及服務

「本校為遵守我政府法令，提高學生抗戰之信念計，曾於今年4月10日舉行國民公約宣誓禮，參政會參政員李仙根先生（簡介於後）蒞校監誓。此後每月一日復舉行國民月會，每次均邀請名流講解抗戰形勢。此外學生會每兩周舉行一次時事測驗，每3周召開時事座談會一次，將時事作有系統的研究。」（出處同上）

(註：《國民公約》於1939年3月12日頒布，其精神是以打擊日本侵略者、防止投降賣國行徑為基本方向，號召民眾不做漢奸、不幫助敵人及漢奸做事。此《公約》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各地民眾紛紛舉行背誦及宣誓活動。)

「去年開學後一月廣州危急，難民之逃至本港，新界者數以萬計，其中無家可歸者亦數千。時錦田難民營尚未建築完竣，且因事起倉卒，服務機關沒有嚴密之組織，本校學生以避難同胞之流離顛沛，殊屬可憫，乃即組織慰問團往錦田服務，幸蒙當局允許，在營中工作一星期後，緊急難民救濟會已成立，學生乃將工作交代。服務期內雖無甚成績可言，唯對難民之安慰、慰勞品物之分配等已盡其職責。且自此之後，港中各界對難民之關懷計日增加，此亦足告慰者也。」(出處同上)



▲全校師生舉行國民公約宣誓禮時，參政會參政員李仙根蒞校監誓。

上述兩段內容，正好勾勒了在國家與民族存亡之秋，黃校長及老師們自覺肩負歷史使命，支持抗戰的立場鮮明，促使年青一代認清抗戰形勢，把個人前途與國家民族興亡連結在一起，做個愛國熱血青年，這顯然成為母校德育教育最聚焦的內容：《國民公約》頒布不足一個月，祖芬校長就帶領全校師生宣誓履行《國民公約》，且邀得極具代表性的人物——參政會參政員李仙根監誓；定期召開時事座談，分析抗戰形勢，培養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此外，音樂科老師更創作多首抗日歌曲，學生在校內唱得朗朗上口，又在抗日募捐大會上高歌，有效地鼓動全校學生的抗日情懷。(有關史料詳見另文第112-118頁)

誠然，除了宣誓、座談之外，母校還注重坐言起行，成立學校員生兵災募賑會，自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開始工作，每學期均發動募捐物資及款項的運動，把財物運送到前線去。上文更縷述了帶領學生主動前往錦田，為避難同胞及時送上關懷。是故，早期校友曾透露，在30-40年代的畢業生中，就出現了選擇奔赴抗日最前線的校友，甚至為此付出了年輕的生命，黃祖雄校友就是一個實證，這種捨身精神絕非偶然，與母校的教育有著因果的關係。

校友會 1938 年誕生

在《校務報告》中，黃校長提及「學校自創辦迄今雖逾13年，而校友會之組織仍未見諸落實。去年夏乃由黎之明君等發起組織斯會，眾推黎君為主席，並定每年7月1日為校友日。現第二屆職員已改選，顏焯新君當選主席。」他還期待校友踴躍加入，以增進校友間之感情，加緊友校間之聯絡云云。



早年校友榜上有名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頒發的是第8屆初中畢業生及第13屆小學畢業生的證書，是中、小學的聯合畢業禮；至於頒獎的名目有各級的學業獎、全年無缺席獎、全年熱誠服務獎3項。當中更出現了某些歷史的巧合現象，就是近十多年來，中華校友會所辦的活動趨向恆常化，且規模亦有所擴展，加上資訊科技的發達，部分早年校友，在近年才重新與校友會建立了聯繫，當中亦不乏對社會有較多貢獻的人士。包括在2014、2015年校友會會刊《國光》中，先後兩次介紹了早年校友馮祝庸與黃祖芬校長數十年連綿不斷的情誼；2015年《國光》更專訪了早年校友黃宜厚教授，介紹了他數十年在內地醫療界所作出的傑出貢獻。而無獨有偶的是，恰恰在這篇畢業禮新聞報道的獲獎



▲ 校歌(1933年版)由冷觀校長親自撰詞。

名單之中，就赫然發現了上述兩位的名字：當年就讀附小四的馮祝庸獲得全年無缺席獎；就讀附小三的黃宜厚獲頒學業獎及全年熱誠服務獎。他倆現年已是八旬開外的老年人了，而他們的校友身分本是無跡可尋，現在卻可在這項新聞報道中得到確實的明證。

校董褒揚辦學成績

「本校創辦人黃冷觀先生，是我的一位同志。他在生前是一位堅芳卓絕的文化工作者。」「中華中學目前已經具有頗大的規模，希望藉着這麼一個好的基礎，將來能夠成為香港華僑教育的中心。校長和諸教師們這樣努力地繼承冷觀先生的事業，這不但是本校的光榮，相

信更會影響到整個的港僑教育，以及社會之進步。」（摘自吳鐵城在學校畢業集會上《致訓詞》）

作為冷觀先生的「同志」，吳鐵城讚美冷觀先生是位「堅芳卓絕的文化工作者」；又作為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多年、當時正主理國民黨港澳黨務，對冷觀先生創辦的學校悉力支持，出任校董會董事長；更在畢業集會上，對祖芬校長所發展的校務給予十分正面的評價，並寄予厚望，盼其能發展成為華僑教育的中心；亦肯定了教師們所付出的努力。在訓詞中，更勸勉學生「在中小學時期，須立定意志。志既立，則將來在社會服務，無不成功。」這無疑點出了母校在當時教育群體中有著某種旗幟性的作用。

主禮人身分顯赫

在有關新聞報道中，出現了多位當時名聲顯赫的人物，通過考究他們的身分，或可更能理解母校在社會上的地位及影響力。下列是當中4位要員的簡介：

李仙根（1893-1943），是文中提到在1939年母校全體師生舉行「國民公約宣誓禮」的監誓人。李氏是廣東中山石岐人士，1908年加入同盟會，曾參與辛亥武裝起義準備工作。1917年開始追隨孫中山先生，曾任其機要秘書，在穗、港從事革命活動。抗戰開始，舉家移寓香港，被任命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後隻身前往武漢、重慶從事活動。1943年在重慶逝世，終年50歲。他的一生，應該說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的一生。他在國民政府內外有著廣泛而友好的聯繫，在廣東尤有人望。

畢業禮3位主禮嘉賓：吳鐵城（1888-1953），祖籍廣東，生於江西。1910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陳炯明叛變時，於香山組織武裝抗擊叛軍。1923年任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曾任上海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國民黨中央秘書長。吳鐵城畢生從事黨、政、軍、外交和僑務等要職，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孫仲瑛（1883-1953），廣東香山人。清末加入同盟會，並在雲南主持《雲南日報》、《滇南公報》等報，辛亥革命爆發，隨蔡鍔、李根源起義響應，任雲南軍政府參議官等。未幾，任孫文（中山）大元帥的機要秘書。其後，長年追隨吳鐵城，先後任上海市政府秘書、廣東省民政廳主任秘書、省府參議等職。抗戰勝利後，曾任廣東省稅務局局長。1949年南下香港，1953年病卒。

高廷梓（1895—1984），廣東新會人。1926年參加中國國民黨。1927年後歷任大學教授、教育部兼任秘書兼社會教育司司長、交通部航政司司長、廣東《晨報》社長、主筆。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歷任交通/教育兩個委員



會專門委員、黨務委員會秘書、港澳總支部委員兼書記長等。抗日戰爭勝利後，歷任交通部航政司司長、交通部顧問、教育部主任秘書、立法委員等。1949年赴台灣。1984年在台灣逝世。

細看以上人物的顯赫履歷，清楚得知他們是民國時期的重要人物，有著充分的代表性。他們均願意應邀出席、主持監誓、參觀校舍、致詞道賀等活動，有力地說明冷觀校長在一眾主禮人心中抱持著信賴與影響力，亦說明祖芬校長深受觀冷校長的餘蔭，及他個人決心繼承父親（冷觀先生）未竟的教育事業，盡力借助社會上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協助學校發展，從而贏得了社會各界的信譽，及在私人辦學範疇中享有地位。

鳴謝

這篇新聞報道得以在浩如煙海、良莠混雜的舊報章裡翻了出來，全仗戰前校友、專事「香港工運」研究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周奕校友，年前在圖書館的微縮菲林中尋找其他資料時所發現。由於報道頗長（4800字）與字跡模糊，內容頗難辨讀。幸得育華第4屆校友黃潔如不辭勞苦地進行艱巨的辨認工作，遂把全文基本上「破譯」出來，為閱讀及分析全文內容鋪墊了條件。校史研究組同人，特此向周奕學兄、黃潔如校友致以真誠的謝意。